

通过宗教学教育、学生工作、校园文化建设等方式，促进理性宗教观和法治宗教观的贯彻落实。其中，宗教学教育要提倡“五个鼓励”：1. 鼓励学生全面了解宗教，并观察、体贴、研究多种宗教；2. 鼓励学生区分法律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活动的保护和限制；3. 鼓励学生全面了解宗教的作用和可能的影响；4. 鼓励学生全面了解选择信仰的原因；5. 鼓励学生拓展自身的知识和能力领域。宗教学教育通过课堂对学生进行宗教认知教育，这要解决“教什么”、“怎么教”和“谁来教”的问题。宗教学课程列入“两课”抑或“通识”体系有待商榷。在校大学生现有的宗教认知主要来自两个途径：辅导员和各个课堂上对宗教感兴趣的教师，但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偏见会阻碍学生对宗教知识的认知。宗教认知教育的重点在于：理性精神是宗教信仰的基础，克服“盲信”的思想行为，并引导学生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较为真切地了解宗教文化现象。

对于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象，北京大学宗教系孙尚扬教授更是做出了实证性的研究。他以北京市大学生（他们向来对社会现实十分敏锐）为调研对象，调查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以此形成的研究报告“国学热、意义的匮乏与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一项基于北京市的调查与分析”揭示了一些信息：1、大学生中确实存在意义匮乏或短缺的问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勤于思考人生意义问题，但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对于自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定位等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答案；2、尽管各种宗教的信徒占总数不到20%，但超过78%的学生表示他们对某种宗教感兴趣；其中，非宗教徒中对儒释道等传统宗教感兴趣的人（占总数的49.6%）远远超过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17.6%），可见国学热对儒释道等传统宗教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弘扬正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3、大学生思考人生意义问题的频率越高，越有可能将信任的目光投向儒释道耶等宗教，这种相关性表明，宗教解决意义问题的核心功能正在北京市大学生中得到彰显。作为补充，中央党校哲学部朱清华博士的“试论耶稣超越生死之思想”一文中指出了宗教生死观对于当代大学生探究人生意义所具有的价值。面对学业和就业压力，大学生的精神问题不单纯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而是人生意义困惑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充分挖掘宗教在这方面的精神资源。

最后，卓新平从两方面总结了这次研讨会：在理论探索上，各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与信仰、有神论与无神论等议题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并展开热烈而深刻的探讨，呈现出一个学术共同体应有的面貌。从中，大家把握了理论的整体性与局部性、论述的体系性与个别性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在社会实践上，学者们已摆脱了“坐而论道”的姿态，本着良知、敏感的精神勇于承担学术的社会责任，通过积极“议政”以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再有，学术探讨中产生的问题同时激发了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精神，这对于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促进中国式的宗教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黄铭，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副教授。）

全真道与老庄学研究的新进展

——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刘固盛

2012年4月13日至19日，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由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道教协会、湖北省道教协会、武当山道教协会和九宫山瑞庆宫协办，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港台及内地的130余位专家、学者、道长与会。在到会的代表中，既有一批成就卓越的资深学者，也有众多论著丰厚的中年专家，还有不少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既有蜚声学界的海外汉学家，又有专心学术的道门中人。可谓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教外教内人士畅所欲言。这是继2008年4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后的又一次盛会。

全真道与老庄学两个领域看似相距颇远，实则联系密切，正如熊铁基先生在2008年会议上指出的，王重阳创建全真道，其教义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全老庄之真”，即从《老》、《庄》思想中寻求真理、真义。王重阳抓

住老子思想的要点“无为”和“清静”、庄子思想的要点“逍遥”、“心斋”等等，革新了道教的教义与思想。可以看出，“全老庄之真”的实质就是道教的发展从教义上必须回到老庄思想上面来，其宗教追求从根本上符合老庄思想的精神实质。从道教发展的历史经验来说，全真道的兴起，以及道教发展史上的几次振兴，大都与道教的回归老庄有密切关系；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一认识有助于道教在新的时代健康发展。时隔四年，海内外学者再次聚集在一起，就全真道与老庄学问题开展深入探讨、交流，为全真道与老庄学的研究以及道家道教文化的进一步弘扬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近80篇，就“全真道”与“老庄学”两大主题进行专门研讨，无论是史料的发掘还是方法的运用，无论是教理的阐扬还是思想的诠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集中体现出学术界和道教界关于全真道与老庄学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成就。

一、全真道研究的突破

就全真道研究来说，此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全真道的教义教理、文学艺术、代表人物、传播与影响等很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获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在：

1. 研究视角的变化

近年来，全真道的研究成为道教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成果不少，此次与会学者能够从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切入，从而发前人之所未发。例如全真道如何回归老庄的问题，虽然上届研讨会有所关注，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新的视角。熊铁基先生论述《道德经》与道教发展的关系，指出凡是《老子道德经》遭到忽视的时候，道教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反之，则道教往往呈现出兴旺的局面，如全真道的发展，这是其“全老庄之真”观点的进一步申述。日本蜂屋邦夫先生指出，王重阳通过研究《道德经》与内丹术而产生了对道的向往，重阳在顿悟内丹术之前就已经受到了《道德经》的熏陶，从道士那里得到的内丹术口诀将他基于《道德经》的理解而建立起的道家式心情大大地推向了道教内丹术的方向。他对《道德经》思想的吸收侧重于“道”的根源性、超语言性、不争谦下的生存方法以及对无为的尊重等内容。王重阳并没有停留在内丹术仅仅关于身体锻炼的术的层面，而是将身体视为一种假托，走向了追求精神解脱的道路，这正是受《道德经》的影响所致，王重阳通过《道德经》而达到精神逍遥的境界。丁原明教授则着眼于全真道哲学的意蕴及其理论底色，认为“真性”论、“真心”论和“真行”论，堪称标识全真道哲学思想特征的三个基本环节。这三个基本环节既表征着“全真”哲学的逻辑建构，又分别从本体论、功夫炼养论和思想、道德行为方面折射其去伪存真的理论底色。今天的全真道倘若选择向其早期优秀哲学传统回归的路径，可能更加有益。王宗昱教授的《评刘处玄的〈黄帝阴符经注〉》以及李延仓的《论刘处玄的经典观》从经典诠释的角度关注刘处玄的宗教理论特色，同样是别具一格的。

以王重阳为首的全真诗歌，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此次会议上的论文仍然有新的贡献。陈耀庭先生结合全真道士的生活状况以探讨全真诗歌的艺术特点，洞察全真祖师的志趣和心愿。陈先生指出，全真道士诗歌具有朴素、虚静、平白的特征，反映了他们玄门清苦的修道生活，体现了他们济世度人的思想，透露出他们淡泊名利的价值标准，以及他们追求恬静无欲的艺术品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决定的。美国汉学家柏夷教授将丘处机的早期山水诗与陆游类似题材的诗歌进行比较，从而彰显丘处机山水诗的宗教性内涵，纠正了过去认识上的一些偏颇。王树人先生“全真道教文化底蕴再探索”，是在2008年会议论文的基础上的继续研究，同样是以全真祖师的诗词为研究对象，关注点却不一样。他指出从创始祖师王重阳开始，具有“白日梦”性质的诗词，其所以成为全真道教体道和传道的重要手段，在于借此能使信众在超越性的联想中改变人生态度；同时指出，全真道所谓三教合一，并非“三教平等”，其中道教与禅宗融合乃是三教合一的核心，全真道在形上学层面超越丹术的提升，主要在于融合禅宗“识心见性”和老庄“清静无为”。

2. 研究时空的拓展

以往对全真道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重视南宋金元，地域则侧重山东、陕西，此次会议论文在上述两方面都有拓展。如全真道在明清直至近代的发展情况受到关注，张琰以明清泰山地区全真道为中心，分析当地士绅与全真道的关系，孔令宏考察清代全真道在浙江台州的发展，秦国师对山东全真教的教团规模与地域分布的调查统计，从1368年延续到1949年；梅莉《侯永德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长春观》与付海晏《安世霖与1940年代北京白云观的宫观改革——以〈白云观全真道范〉为中心的探讨》两文，以近代全真道南北两座著名宫观的人物与事件为核心的研究，揭示出全真道在近代发展的曲折历程，也反映侯永德、安世霖等全真道士为振兴本教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潘一德道长则结合全真道明道、积德、修丹的教义，对全真教在当代如何积极发展作出了

有益的思考。从研究空间来看,汪桂平《金代全真道初传东北考》一文,对过去较少关注的全真道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情况进行了考察,论文通过对藏内外文献和碑刻资料的钩沉,认为金代全真道创立不久,即已传播到东北的辽西一带。其中全真七子之的郝大通、王处一,马钰的弟子刘真一,丘处机的高徒于通清等人,都曾到过东北弘道。经过这些高道的弘演阐扬,全真道在东北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刘雄峰《从白云山到岱岳殿——全真道教在晋陕北地的传播和影响》、刘康乐《明南京全真道教考》、许尚枢《天台山与全真道》等文,展现出全真道在不同区域的演进历程。

3. 研究材料的发掘

对新材料的发掘与运用,是全真道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保证,王卡教授的论文《雍正皇帝与紫阳真人——兼述龙门派宗师范青元》不仅选题新颖,论述精辟,在材料的择取上亦有示范性意义。该文使用《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帝《御选语录》、《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大清会典》等档案性史料以及一些罕被知道的地方志、宫观志、文集,揭明雍正帝优崇紫阳真人的原因和史实,指出雍正帝是清代对佛、道二教扶植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对禅、道二门颇为关照,编修经书语录,封赠禅僧道士,敕建寺院宫观,御制庙额碑文等优崇礼遇不断。雍正帝特别优崇的道士有两位,一个是张伯端,一个娄近垣,他们所代表的道教全真、正一两大教派,因此一度兴盛。论文由紫阳真人而涉及清代龙门派宗师范青元的行迹考辨,又为研究清代龙门派提供了新的线索。盖建民教授在做田野调查时,收集到民间散佚的《灵济宫神文志》,据此与《道藏》灵济派文献及地方文献相互参证,解开了永乐皇帝何以崇信二徐真人以及二徐真人信仰何以能够由一种地域性的民间信仰发展演变成一个独立道派等谜团。赵建勇根据碑刻文献,对全真道龙门派重要人物姜善信的教行进行了考述;杨立志教授根据武当山碑刻材料,结合明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考证明代武当山全真道著名道士丘玄清、张三丰、李素希、李玄成等人的事迹,探讨他们与明皇室的关系,研究全真龙门派传入武当山的时间及传承情况。由上述成果可以看出,档案材料、地方文献、碑刻资料等是推进全真道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4. 研究内容的深化

此次会议论文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全真道教义、思想、修道实践、弘道方式、历史影响等多个方面。张继禹道长从实证的角度谈修心澄心与体道明道的关系,吕锡琛教授据王志谨《盘山语录》阐述其心性修炼思想,戈国龙研究员从全真道性命双修的立场看内丹学的三教观,李似珍教授比较宋元全真道与正一道教义异同,范恩君道长论析济南华阳宫三教圆融的特色,他们的研究对全真道教教义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张应超研究员综论“七真”对全真道创立与发展的贡献,周立升教授阐扬谭处端的弘道与修真生涯,张兴发道长述评丘处机对全真道的传播及其影响,所论都不乏新见。张泽洪教授对金元明清时期全真道的唱道情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全真道的唱道情并非是等闲之情,它蕴涵着深邃的人生哲理,是道教与民间文化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道情可谓融大小传统于一体,是道教思想与文学样式、民间文化成功结合的典型例证。此外,郭武教授对全真道宗派“字谱”的关注,尹志华博士对雍正帝杀道士贾士芳案的辨析,曾金兰从地缘关系论李珣与丹道南北宗的关系等成果,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全真道的有关研究。

二、老庄学研究的进展

老庄学作为道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不仅自身形成了博大的学术体系,与道教文化的关系亦十分密切。本次会议关于老庄学的论文很多,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研究的进展:

1. 老庄文本与思想研究

丁四新教授以简帛《老子》、《周易》为例,讨论古典文本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及“文本”与“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尹振环教授据帛书本探讨唐玄宗对《老子》经文的删改问题,容志毅教授通过解释帛书《老子》“道之物”,考证“道”字的原始含义;刘固盛教授则从版本的珍贵性、资料的丰富性、整理的规范性等方面提示了《老子集成》的文献价值。白奚教授《从“辅万物之自然”到“无以人灭天”——道家对人类中心观念的反思》、李刚教授《厨房里的政治哲学——治大国若烹小鲜》、谢阳举教授《从道家的观点看“仁者爱人”》等文,将学理分析与现实关怀结合在一起,富含启迪。香港邓立光教授论老子之道与体道,邝国强教授谈老子之德与人生,其中蕴含各自的亲身体验与感悟。在《庄子》研究上,张永义分析《齐物论》的义理脉络,自成一说,蔡林波解读《庄子·则阳》“或使说”,小中见大。张松辉教授对庄子哲学中的道、气含义及道气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裘梧认为庄子哲学之“生”是从“世人之生”、“万物之生”、“天地之生”和“大道之生”的不同境界而层层展开的;李明珠教授论述庄子“隐”的精神文化气质,认为庄子的“隐”乃“独见独晓”,它具有超越世俗的情怀,深邃高远的境界,独立不羁的精神,重人轻物的文化气质,“至乐”“大美”的追求,

还有率性任真、人之为人的活法。孙亦平教授则指出，庄子从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将老子对人的生命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与身体关系的“生命哲学”之特征，其中洋溢的幸福观，今天读来特别令人省思。

2. 老庄注疏研究

对老庄注疏文献的重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目前的相关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对此，本次会议也有不少新的收获。黄海德教授从王重民《老子考》出发，论析该着对于老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陈丽桂教授认为《河上公章句》解老，体现出从哲学、养生到宗教的思想进程；唐明邦先生分析全真高道宋常星的《道德经讲义》，阐扬其尊道贵德、劝世化俗的精神。徐华《钟会〈老子注〉的诠释路向及生成背景》、刘玲娣《张纯一〈老子通释〉研究》、王丽英《汪兆镛其人及其〈老子道德经撮要〉》、吴成国《老子“人君南面之术”的再认识——张舜徽先生〈周秦道论发微〉读后》等文，综论古今《老子》注疏作品，不乏新见。关于《庄子》注释的研究，陈静研究员认为宋代吕惠卿《庄子义》的特点是“文”胜于“义”，对吕惠卿的庄学思想需要在宋代政治和思想的大背景下解读，才能够得到更有价值的认识；吴受琚研究员新发现的清代沈彤精抄、精批本《庄子》经眼录，是庄学中稀世之本，不仅可补庄学文献之缺漏，对庄学研究的价值亦不可低估。此外，邢益海博士从《药地炮庄》看司马迁的庄学，刘韶军教授对章太炎庄学的分析，肖海燕关于刘文典庄学的研究，都别具一格，各有特色。

3. 道家思想新解

许抗生先生认为，道家创始人老子，首先从“道法自然”的学说中，推演出了人的自由的观点，之后，黄老之学提出了因循“人之自为”的思想，庄子更提出了超越物我限制的精神自由的学说，把“自由”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陈鼓应先生《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家学脉关系——兼论濂溪的道家生活情趣》一文指出，周敦颐在学术思想上，以《太极图说》为例，其世界观源自老子宇宙生成论的范式，体现出老子智性的哲学思维；在生活情趣上，则展现出“风光霁月”的艺术境界，流露出魏晋庄子式的文人风格。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他的哲学理论正是他的生活情趣及精神意境的体现。韩国金白铉教授比较中国道家思想与韩国东学思想之间的异同，由此探究21世纪道学（道家与道教以及东学）与神明文化的新出路。韩国曹玟焕教授总结朝鲜朝儒学信奉者诠释《老子》的特点，使我们了解到朝鲜朝老学的大致情况。樊光春、陈文龙通过《通玄真经》所载文子思想的梳理，系统比较了老子和文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内涵，探讨两者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具有一定新意。

三、今后研究的几点展望

通过两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无论是全真道还是老庄学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获得学术界和宗教界的更多关注。当然，鉴于全真道的复杂状况与老庄学的丰富内容，目前的研究仍然是不够的，全真道与老庄学研究领域还大有可为，个人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尤其需要加以重视。

1. 全真道教义与老庄学的关系

毋庸置疑，全真道教义是符合老庄哲学精神的，这次会议也有熊铁基先生和蜂屋邦夫先生两位学者的论文对此进行阐述，但总的来说，全真道与老庄学的关系问题，仍然可以进一步加以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关涉全真道哲学理论基础与宗教神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许多全真高道诠释老庄，从他们的诠释中可以看出全真道宗教思想以及教义教理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全真宗师更多的是在宗教实践中贯彻老庄精神，也就是运用老庄，弘宗演教。因此，如何将全真道与老庄学两者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细致的研究，值得期待。

2. 全真道与区域文化

当前，区域史包括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历史学视野拓展和范式转型的主要趋势”，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自然包括宗教文化的内容。由于全真道的历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点，那么，借鉴“文化人类学”、“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相关理论，从“时间与空间”、“文献与思想”、“宗教与社会”等各个维度，在区域文化史的视域下对全真道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进行综合考察，相关研究必将取得新的突破。

3. 全真道与现代社会

道教作为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至今仍然具有广泛的信众和流传的土壤，适当吸收并弘扬其优秀成分，对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培育道德精神，都十分有益。而从全真道本身来说，其教规、教制、教理与现代社会也有不兼容的地方，如何进行合理更新，做到与时俱进，需要教内人士与教外学者加以关注和重视。当前，中

国道教协会倡导道教的发展要从精神上回归到《道德经》，从老子哲学中获取思想养分，提升文化品格，从而发扬光大，这是非常可取的，而全真道与老庄学研究的最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刘固盛，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

王 帅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专家座谈会于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研究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的领导和专家也出席了此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就三个议题——“基督教中国化”面临的关键问题、“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规划、“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规划，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座谈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主持。张志刚教授首先向与会专家学者汇报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的学术构想：一是定位于学术立场，立足于中国国情，以理性的、客观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基督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二是树立国际学术视野，围绕国内外理论界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或前沿课题，诚邀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进行长期而深入的合作研究；三是顺应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呼应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就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基督教如何真正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怎样才能走向世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对话与合作等，积极地探索富有建设性的、前瞻性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

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研究员做了主旨发言。他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这一项目意义重大，在政治上值得关注，在学术上急需探讨，在宗教上尚待摸索。卓新平研究员通过对比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发展的差异，点明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定位问题，解析基督教对中国三大群体——普通群众、知识分子、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同影响，全面回顾基督教中国化的五个历史阶段（唐代、元代、明末清初、鸦片战争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充分肯定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其难度与挑战。卓新平研究员强调，我们今天推动基督教中国化，一方面要把中国的教会看作我们自己社会中间的一种健康的、有机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国际、国内两大层面着眼，需要政界、教界、学界的共同努力与真诚合作。在发言结束之际，卓新平研究员表达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宗教理解等问题上能够承担起其应有的使命。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分四场就基督教中国化问题进行了自由而深入的讨论，并达成一点共识，即充分肯定“基督教中国化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在研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诸多困难与阻力，需要政界、教界、学界通力合作，以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牟钟鉴先生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将为宗教工作管理部门、民众、其他宗教与基督教和睦相处提供有益的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周宁院长高度评价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这一项目对基督教自身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认为这一项目不仅有助于基督教的文化、信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基督教现状的改善，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料，并有益于改变党政部门、学界、教会等对基督教存在的一些保守的、有偏差的观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沈桂萍教授强调，在当今物质飞速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背景之下，迫切需要精神层面加以跟进。这一项目，无论从价值理性还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而言，亦无论是对教会还是社会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宗教文化出版社戴晨京社长也对这一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并表示将大力支持“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的出版。

基于以上共识，与会专家学者们进一步就“基督教中国化”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疑问与建议。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基督教中国化”的题解，即何谓基督教中国化；（2）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3）怎样推进并实现基督教中国化。

围绕何谓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题解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基督教中国化的本质内涵是什么？中国